

中国的人口危机与应对

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北京 100871)

摘要: 对我国的结构性人口危机大致可有三个基本判断:即低生育常态化,人口优势在悄悄减弱,大国空巢或将老无所依。基于三大判断,讨论中国人口的出路问题,关注人口的内涵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打造和建设实力型、创新型、团结型、平衡型和自强型“五型中国人口”是值得全体国人共同奋斗的人口优化发展目标。中国不仅应当保持“人口大国”的优势,而且要培植“人口强国”的优势。

关键词: 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人口生态失衡;人口优化;人口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C 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9)05-0069-08

随着时间的推延,中国自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就开始暴露和积累的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和性别失衡为主线的结构性人口危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共鸣。种种迹象和研究均表明,我国的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和人口生态失衡已经常态化,而且会演变为长期化的趋势。结构性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对我国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发展带来巨大风险,对此不可不察。本文对1980年以来逐渐形成和显化的新人口危机形成了三个基本判断:即低生育常态化,人口优势在悄悄减弱,大国空巢或将老无所依。然后根据这三大判断,讨论了中国人口的重建与出路问题。

一、低生育常态化

基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人口的生育率就持续低于更替水平以及2016年以来全面二孩新政“遇冷”的事实,可以认为中国已经陷入“低生育率陷阱”。^①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大数据告诉我们,21世纪的中国人

口很可能进入了持续的超低生育率发展阶段(2000年, $TFR = 1.22$; 2010年, $TFR = 1.18$),掉入了更深的“内生性低生育率陷阱”(TFR 低于1.5抑或1.3),“陷阱”出现了固化、深化和内卷化等特征。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人口开始积累起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势能。人口是慢变量,人口观察需要一个大历史的视角,对这种内涵丰富的静悄悄的人口变化,一般人是感知不到的,好比是“温水煮青蛙”,大国人口失衡所带来的社会风险越来越远亦越来越大。国际比较研究发现,低生育率持续大概二十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才能引起足够重视,鼓励生育的政策需要较长时间执行才能显出效果。^②

当下的中国人口正处在重大转折期,已经迎来持续低生育率时期、人口负增长时期、后计划生育时期。

首先,2000年以来中国恐怕已经进入更深的低生育率陷阱,其时根据人口普查大数据得出的总和生育率 TFR 已经低到1.22,但当时几乎完全忽视了“低生育的惯性风险”。有数据显示,近年

收稿日期: 2019-03-30

作者简介: 穆光宗,男,浙江象山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① 一般认为“低生育陷阱”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生育率持续进入生育的更替水平(TFR 在2.2左右)以下。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际学术界甚至提出 TFR 在2.5以下可以被称为“低生育率”,体现了生育率高低的相对性。另一种是总和生育率 TFR 低于1.5甚至1.3,后者亦称为“超低生育率陷阱”。低生育陷阱的理论探讨可参见靳永爱:《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事实与启示》,《人口研究》2014年第1期,第3—17页。

② 茅律彦、申小菊、张闻雷:《人口惯性和生育政策选择:国际比较及启示》,《南方人口》2018年第2期,第15—28页。

TFR 一直低于 1.5,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6》数据显示: 2015 年的总和生育率更是仅为 1.047, 这一数据甚至不及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一半。中国在 2010、2011、2012、2013 年的总和生育率仅有 1.18、1.04、1.26、1.25。研究发现, 妇女未婚比例不断提高和一孩生育水平不断走低是 20 多年来中国低生育进程的特征。^① 虽然对国内生育水平到底多低存在争议^②, 种种争议也因为数据、方法和视角的不同和局限而得到包容; 但不影响我们对中国人口已经出现持续下跌的、很低的低生育率这样的总体判断, 而且从人口战略未雨绸缪、规避风险的策略来看, 宁信其低不信其高应该是上策。

我国遭遇的“低生育率陷阱”有这么几个特点: (1) 在性质上, 属于内生性而非外生性。低生育的形成既与人口控制有关, 更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有关, 从而形成超稳定的格局。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表明, 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和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 1.96 和 1.75 个, 低于更替水平。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 很多调查都佐证了一个事实, 我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意愿不到两个孩子^③, 这是进入“内生性低生育率陷阱”的基本依据。始于 1974 年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会议,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的经典论断就流传至今。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 生育转变有一个规律性呈现, 即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出现代际弱化的趋势, 中国已经跌入内生性

低生育深井。年龄越低的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越低, 而且新生代的生育能力堪忧。由于青少年未婚同居现象增多, 未婚先孕、人工流产和不孕不育等不安全的性和生殖健康问题日趋突出。数据显示, 我国每年人工流产多达 1300 万人次, 这个惊人的数据还不包括药物流产和在未注册私人诊所的人工流产数据。(2) 在程度上, 呈现出超低水平低生育。(3) 在范围上, 不是局部地区才有, 而是全国范围大面积出现。(4) 在时间上, 具有长期性而不是短期现象。低生育现象的出现也不是朝夕的事情, 低于更替水平持续近 30 年了。(5) 在趋势上, 具有继续走低的内卷化倾向, 低生育具有不可逆的刚性。我认为, 中国生育率反弹的特性已经丧失, 越往后生育率会越低, 何况我国鼓励生育政策的配套反应往往滞后, 生育率出现继续缓慢下降的内卷化惯性。独生子女文化具有社会遗传性, 生育率反弹特性丧失是因为迅速传播的低生育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这为国际经验所佐证。中国实施了 35 年之久的一孩化政策具有双重的作用: 一是对生育行为的限制和约束作用; 二是对“只生一个好”低生育观念的涵化和促进作用。

虽然很多调查证实了国内多数年轻家庭的理想子女数两个居多, 但实际生育水平却容易低于 1.5 甚至 1.3 以下。那么, 为什么实际生育率会低于理想子女数呢? 这是因为实际生育率是条件生育率, 生育不仅仅是家庭的理想, 而且是实实在

① 郭志刚:《中国低生育进程的主要特征——201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启示》,《中国人口科学》2017 年第 4 期, 第 2—14 页。

② 郭志刚认为, TFR 为“1.8”的官方口径明显高估, 超过了多次实际调研发现的水平, 相反地, 生育率已经很低甚至极低, 1995 年以来就基本保持在 1.5 以下, 得出“生育率过低”的结论并且提出“低生育率风险”的预警。参见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率与被忽略的人口风险》,《国际经济评论》2010 年第 6 期, 第 112—126 页。郭志刚:《清醒认识中国低生育率风险》,《国际经济评论》2015 年第 2 期, 第 100—119 页。根据对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 2006—2016 年的 TFR 在 1.41—1.78 之间波动, 均值在 1.65。参见贺丹、张许颖、庄亚儿、王志理和杨胜慧:《2006—2016 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基于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人口研究》2018 年第 6 期, 第 35—45 页。陈卫、段媛媛:《中国近 10 年来的生育水平与趋势》,《人口研究》2019 年第 1 期, 第 3—17 页。

③ 侯佳伟等基于 1980—2011 年间开展的 227 项关于中国人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考察了生育意愿的纵向变化趋势。研究发现, 1980 年以来中国人理想子女数呈减少趋势。2000 年之后主要表现为“儿女双全”的二孩生育意愿, 平均理想子女数基本稳定在 1.6—1.8 人之间。1990 年之后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 即人们实际生育子女数少于理想子女数。参见侯佳伟、黄四林、辛自强、孙铃、张红川和窦东徽:《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 1980—2011》,《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 4 期, 第 78—97 页。

在的生活成本,需要考虑各种条件是否具备。条件生育率也是理性生育率,一旦考虑了生儿育女所需要的经济条件、时间条件、住房条件、人力条件和精力条件,生育就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和压力。研究发现,一孩总和生育率从2011年的0.88下降到2016年的0.67^①,这是低生育陷阱深化的一个信号。这个变化与极晚婚极晚育的婚育模式的形成有很大关系。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2006—2016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上升到26.3岁;与此同时,我国20—34岁女性已婚比例从75%下降到67.3%^②。

高生养成本是低生育模式形成极为重要的原因,我国的低生育是成本约束型的。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58.9%育龄妇女选择不打算再生育的第一位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其次是年龄太大(21.8%)。那么,育儿成本究竟包括了哪些?为什么高得离谱让两个孩子的家庭生育梦想一个个破灭?育儿成本需要考虑生命历程因素,育儿成本到什么时候是个头?一般到孩子结婚成家为止。甚至在小家庭建立之后,还有一个次生的育儿成本,就是对第三代的各种付出甚或各种啃老。生育与养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孩奴”的说法得到了大多数家庭的认同,“代际倾斜”已经到不堪承受的地步,如果孩子不争气,那就更是苦不堪言。

何况有些育儿成本是难以确定和预期的,例如医疗成本,如果孩子不幸患上大病,就可能倾家荡产。有些育儿成本是可见的,也有不可见的。比较明确的育儿成本是受教育成本,现在的家长在很多培训班面前都不淡定。育儿成本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大致不符合经济理性。据国家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74.5%、61.1%、

60.5%,第一位因素依然是抚养成本太高。有调查显示,育儿成本已经占到我国家庭平均收入接近50%,教育支出是最主要的一个负担。托育服务短缺严重,我国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看护。同时一些用人单位,担心女性生育二孩提高用人成本,就业歧视问题也有所显现,一些地方女性产假、哺乳假等权益落实不到位。母婴设施缺乏,女性在兼顾家庭和事业发展方面,存在着很多的顾虑。

在文化层面上,传宗接代的核心价值不再得到重视。在传统社会和古典中国,生儿育女对家国的责任和义务深深楔入了中国人的生命价值体系,是值得每一个家庭推崇的“香火信仰”。高生育的背后有重男轻女的推动,不生男孩不罢休,成为传统社会高生育的动力。现在性别平等了(如妇女能顶半边天),刺激多生育的性别偏好动力也因此消失。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和劳动参与率的提升也延迟了初育时间(初育即晚育),提高了生育的机会成本,共同促成了低生育。

如此看来,低生育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所以,低生育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新时期的生育常态。这种低生育格局的出现节点大概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酝酿于1980年严格一孩化政策出台之后(政策性低生育率陷阱)。^③如果说1950—1970年是人口爆炸性增长的时代,那么1970—1979年是人口得到柔性控制、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后期转变(出生率下降为主导)的“黄金”时代——既满足了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对低生育的要求同时满足了短缺经济对低出生的要求,而1980—1990年为开始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时代,1990—1999年开始进入低生育时代,2000年开始进入超低生育时代。我们长期以来怀疑低生育的事实,怀疑数据质量(有水

① 贺丹、张许颖、庄亚儿、王志理和杨胜慧:《2006—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人口研究》2018年第6期,第38页。

② 贺丹、张许颖、庄亚儿、王志理和杨胜慧:《2006—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人口研究》2018年第6期,第36页。

③ 我国平均的政策生育率为1.47,研究发现: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处于1.3—2.0之间的政策生育率地区,实行1.5孩生育政策的人口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参见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和王丰:《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人口研究》2003年第4期,第1—10页。

分),一再错失政策调整的良机,结果是生育率一低再低。在人口太多是一切中国问题根源、少生就是一流的主流观念导向下,低生育所积累的风险被大大忽视了。

其次,极可能在未来10年内(2018—2027年)迎来人口自然负增长的拐点。尽管个别有远见的人口学者早已提出预警,但仅仅几年前,人口负增长似乎还是一个太过超前的未来学话题。然而随着人口预测参数的不断修正,我们蓦然发现,人口负增长恐怕已近在眼前。易富贤、苏剑认为2018年是中国人口历史性转折点,开始负增长。^①中国社会科学院2019年初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称,如果TFR保持在1.6,全国性人口负增长将于2027年到来。出生人口减少是一个值得引起关注的信号,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全国出生人口1523万人,比2016年减少263万,比2017年减少200万。王丰等早期研究发现,早在1990年时我国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就已经由正变负。此后持续十几年的低生育率正在逐渐累积起人口负增长惯性。基于不同的模拟方案结果揭示出,人口负增长惯性将会对未来中国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有重大影响,该文提出中国人口发展正处在转折的关键时期,必须尊重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②茅倬彦研究则从区域差异看人口惯性,1982—2000年中国各省人口惯性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正在急剧减弱,各个省份正在从强烈正增长惯性类别向负增长惯性类别聚集。高达70%的省份的人口惯性已经告别人口强正增长惯性,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四个省份已经呈现人口负增长惯性。^③上海等地户籍人口负增长、区域性常住人口负增长、延边朝鲜族人口负增长等区域性人口负增长现象早已出现。^④

人口负增长的惯性将是巨大的,我国人口缩减也许会呈现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迅猛之

势。由于生育责任和生育意愿代际弱化、生育成本和生活压力却代际强化,生育越来越工具化、功利化,生育的积极性大大下降。有三种情况使得全面二孩政策大打折扣,一是不能生,全面二孩的目标人群有60%过了适龄生育的年龄;二是不想生,不想做“孩奴”,想轻松点;三是不敢生,压力太大甚至逃避生育,望二孩生畏而却步。生育成本的考量需要结合生养周期,一般来说,广义的生育成本包括了到孩子成家为止的一切开销,而现在的婚嫁成本很高。而且生男孩女孩,父母的心理感受也不同。生儿子好比是“建设银行”,生女儿好比是“招商银行”,所以城市地区出现了新的生育偏好——女儿偏好。现在生育行为日趋理性,是与整个生养周期孩子带来的巨大压力分不开的。关于二孩生育意愿的调查发现,只有不到20%的目标人群可能有生育二孩的打算,估计总和生育率不会超过1.3。也就是说,无论采取多么积极的人口生育政策,中国都难以在短期内跳出低生育陷阱。

在“十三五”期间,我国15—49岁的育龄女性人口每年递减500万以上,这意味着人口出生量的减少有某种必然性。譬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就比2017年减少500万余人。2015—2020年,估计我国20—29岁的适龄生育女性数量将减少2876万人。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持续的低生育对人类不是福音,中国也不例外。因为生育的数量、素质和结构决定着人口发展的未来,生育率下降发挥的是釜底抽薪的减法效应、坍塌效应。所以,对于人口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而言,我们必须意识到人口少子化的挑战其实要大于老年长寿化或者说高龄化。“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构建生育友好型政策体系,提高生育率的战略窗

① 易富贤、苏剑:《2018年:历史性的拐点—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今日头条,2019-1-2。

② 王丰、郭志刚、茅倬彦:《21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人口研究》2008年第6期,第7—17页。

③ 茅倬彦:《我国人口惯性的区域差异研究》,《人口与发展》2011年第6期,第70—79页。

④ 参见陆杰华:《人口负增长时代:特征、风险及其应对策略》,《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1期,第21—32页。陈蓉、顾宝昌:《历史性转折还是短暂性波动——对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由负变正的考察》,《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4期,第109—115页。朱国宏:《面对负增长:上海人口政策是否需要改变》,《人口研究》1995年第1期,第3—9页,等等。

口期,否则将面临生育率失去弹性、人口负增长惯性强化的双重挑战。^①

再次,后计划生育时期将面临人口负债和计划生育代价问题,如比较普遍的有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年轻劳动力人口的短缺问题。后计生时期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政策限制生育的条件下人们有了更低的生育意愿,即政策生育水平高于意愿生育水平,意味着政策性计划生育其实已无必要;另一种理解政府对计划生育进行了历史的切割,从过去的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乃至奖励生育,标志着传统计生时代的终结和后计生时期的到来。显然,迄今我国处在第一种含义的后计生时期,同时将迎来第二种含义的后计生时期。

二、人口优势在悄悄减弱

学界的认识是,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到有限供给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② 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人口优势逐步丧失,人口结构扭曲、人口潜力不足的劣势明显凸显。

中国传统的人口优势在不断丧失。其一,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时代将使得人口的规模优势在21世纪20年代之后明显下降,人口规模是影响消费市场的重要因素。2017年7月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接受《华盛顿自由灯塔报》采访时说,“中长期看,中国有可能成为美国最大的对手”,原因是中国“有蓬勃发展的经济,而且有庞大的人口基础”。然而百年之后,长期的人口负增长将使人口总量锐减至5亿甚至3亿以下,年轻人口的创新力、竞争力、战斗力将伴随少子化、少劳化而不断下降。

其二,低生育使得人口的潜在优势丧失。适度的生育水平确保人口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前景。中国严峻的人口危机其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低生育危机或者说是后续的少子化、少劳化危机。生育是人口发展的源头,持续的

低生育好似釜底抽薪,是年轻人口亏损危机的根本所在。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的生育常态,很难逆转。低生育导致少子化,年轻人口减少(少劳化),人力资源储备不足,长期的计划生育已经积累起严重的年轻人口亏损问题,低生育惯性将使人口的潜在优势进一步丧失。劳动年龄人口是一国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母体,然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11年到2018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了近4000万人,今后仍将进一步减少。

其三,人口老龄化使得人口的结构优势不断丧失。我国从1999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到2018年,老年人口净增近2亿。2017年新增老年人口首次超过1000万,2018年新增800多万,养老压力上升。2018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首次超过14岁以下少儿人口比例。人口太老不仅没有前途,而且缺乏力量,包括创造力、生产力、消费力、战斗力等。理想的人口年龄结构状态需要将赡养比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理想的人口状态是:生育水平在更替水平上下,人口的平均年龄在35—40岁左右,人口结构相对平衡和谐,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对平缓,人口发展相对均衡稳定。

人口转变是一个被世界各国证明是人口发展的规律,人口转变增长恰恰为后人口转变时期也就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储备了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从而为人口的红利贡献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年轻劳动力(20—44岁)是最重要的经济资产,是一国人口实力的象征。人口转变增长是阶段性的“人口福祉”,如今一去不复返了。“婴儿潮”积累起了潜在的人口优势,也可以为婴童经济提供“孩动力”;“劳动力充裕”或者“无限供给”为“世界工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产要素。生育为什么重要?因为它说到底是新生代人力资源的源泉。所以人口问题至少要看

① 茅倬彦、申小菊、张闻雷:《人口惯性和生育政策选择:国际比较及启示》,《南方人口》2018年第2期,第15—28页。

② 2004年以后国内出现愈演愈烈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蔡昉敏锐提出中国经济已经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判断;并认为珠江三角洲爆发的民工荒是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转变阶段相交织的必然结果。参见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第4—13页。

15—20年,婴儿潮连带着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这就是人口学讲的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

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的婴儿潮都不可能出现了,婴儿潮的出现需要几个条件:一是生育人口(生育旺盛年龄段的女性人口有多少),二是她们的生育能力,三是她们的生育意愿。三个方面都有弱化的趋势。

三、大国空巢或将老无所依

目前,我们对人口负增长缺乏警惕。问题在于,人口总量下降的同时人口结构进一步扭曲、畸变。我们要担忧的与其说是人口总量的庞大,不如说是人口结构的扭曲、人口生态的失衡和人口储备的不足这些问题上。人口总量只是表象,我们需要从结构——功能主义和关系——和谐主义的双重视角来看待新的人口危机。譬如,2019年3月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有16次谈到养老,史无前例,体现了对人口老龄化的积极应对。2018年年底,60岁以上人口是2.49亿多,占总人口比重17.9%;根据预测,到2050年国内的老年人口总量将达到4.8亿人,占比34.1%。我国有超过5000万的农村留守老人,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进城,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日趋突出。到2050年,我国临终无子女的老年人将达到7900万左右,空巢老年人占比或在90%以上,大国空巢将成普遍挑战。

新人口危机是由持续的超低生育率、严重的人口少子化、劳动年龄人口连年减少、不可阻挡的老年人口高龄化、严重的性别失衡导致的婚姻挤压和单身现象、人口大城市化导致区域人口分布不平衡(人口疏密不均)等交织在一起。各种人口问题纷至沓来,而且转化为经济社会问题,演化为系统性问题,难以治理。一是人口增长乏力,二是人口结构坍塌。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社会总体可

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展望未来,因为持续低生育的釜底抽薪效应和深度老龄化的养老负担效应将会演化为大面积的人力资源短缺特别是年轻女性人口稀缺问题,社会经济的主力人口和中坚力量缺失,服务性行业不振,亚人口之间难以互相支撑,人口结构性坍塌,形成内生性人口问题恶化。譬如,我国老年人口失能率高达11—15%,社会养老服务的主力资源是女性人口,但护工短缺问题已经初露端倪,今后会更加严峻。2010年,我国老年失能人口大约3000万,预计2020年达到4200万,2030年超过6000万,2050年接近1个亿;老年慢病人口预计2020年超过1.5亿,2030年将近2.2亿,2050年将近3亿。^①

四、讨论与展望:人口危机的应对

在新人口危机面前,人口大国之人口价值观、人口问题观、人口发展观和人口治理观也亟需与时俱进,迅速完成转身。值得讨论的问题有两个:

第一,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在依靠人力资源为主(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形态中,经济下行恐怕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脱不了干系^②。劳动力供给总量下降,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首次出现下降,预计今后几年还将继续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导致人口实力减退,而持续的低生育率是若干年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的原因,同时低生育率会导致人口的底部老化,导致老年人口的相对增加。在理论上,维持年轻劳动年龄人口的稳定供给是必要的。需要区分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人口,前者是年龄指标,后者是能力指标,二者是交叉关系不是重叠关系。

人口变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还是风向标?人口与经济不是封闭的循环,人类的制度等中介变量会改变二者的关系。要看经济下行和劳

①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子课题组:《健康老龄化与老年健康支持体系研究》,北京:华龄出版社2014年版,第149—150页。

② 周天勇研究发现:20年前人口增长速度决定20年后经济增长速度;政府和社会双重调节下形成了“人口坑”,2.1的总和生育率是一国人口长远是否安全的警戒线。参见周天勇:《诠释经济下行:人口与发展经济学的一些新进展》,《财经问题研究》2016年第10期,第3—9页。

动力供给的关系才能判断计划生育的远期影响。从中长期看,二者关系密切,20年前的人口增长为20年后的经济增长提供年轻劳动力,这时候人口增长的经济影响有一种滞后效应,1950—1980年的人口增长储备的经济主力人口(假定劳动年龄上限为44岁)活跃到2024年,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完全是因为1980年以后一孩化政策的推行,现在活跃在经济领域一线的年轻劳动力已经完全是一孩化时代所生产的。短期看,不一定明显,不应陷入“单一的人口决定论”;还有其他变量影响经济增长,如投资、政策、文化、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人口固然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但同时也是发展的目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理念。提高全体人口的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人口与经济是互为依存、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目前和将来,中国的问题是“人口压迫生产力”,人口变量形成了短板约束效应。

第二,计划生育何去何从。到了低生育、少子化和老龄化时期,计划生育需要改革和转型。简单说,就是一分为二,生育决策归家庭计划,生育服务归社会计划。计划生育要去其强制性,强其服务性。在今天我们为低生育的实现付出代价的时候(突出如失独问题和养老问题),解铃尚需系铃人,国家需要承担起后计划生育家庭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中国生育转变的目标是实现近更替水平的“适度生育率”,TFR最好落在1.8—2.5的区间内,但实际生育率却多年保持在1.5以下。而且从我国已经进入的低生育陷阱的性质来看,是内生和稳固的。我们不能因为全面二孩政策的一点有限正向效应的释放而过于乐观,应该为已经悄然形成的“内生性低生育趋势”居危思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小幅减少63万;2018年出生人口比2017年再减200万,已经给出了极端低生育和少子化出现的信号,2019年估计也不乐观。

中国人口治理的思路需要来一个大的逆转:首先,生育权是每个人的权利,这是地球人的共识与常识。其次,船大要早掉头,持续的低生育会形

成负增长惯性。年轻人口增长是人口红利的源泉,年轻人口减少是人口负债的开始。考虑到生育率过低的风险,所以国家需要及时鼓励奖励生育。再次,区分人口的存量和增量问题。人口的存量是历史的遗产,应该善待;人口的增量则预示未来的潜力,应该欢迎。将人口的存量问题归咎于增量,是“头疼医脚”的荒诞做法。第四,人口是慢变量,变化有周期性,特别需要提前警惕和预防治理,人口问题的治理需要时间上的提前量。

中国需要在人口认识上快快觉醒。迄今,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施形成了两大惯性:一是“人口负价值”的认知惯性,将一切中国人口问题归咎于人口太多,当前在中国已经有了如此严峻的低生育危机的时候,还有人在重复中国人口还是多了这样的观点;二是人口发展的内在惯性,正在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地从正惯性转向负惯性。

中国人口已经演化到远远不是生育率的高低可以涵盖的复杂问题,虽然低生育率构成了“元问题”。人口价值观决定了人口发展观,人口问题观决定了人口治理观。将人口视为资源,它就能带来财富;将人口视为包袱,它就会带来负担。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怎么看待人口,人口就会变成什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口价值需要重视,人口规律需要敬畏,人口生态需要保护,人口发展需要优化,人口问题需要统筹。

在社会人口学和人文人口学的视野中,中国需要意识到人口发展方式的转型问题,关注人口的内涵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重建大国人口。打造和建设实力型、创新型、团结型、平衡型、自强型“五型中国人口”是值得全体国人共同奋斗的人口优化发展目标:

其一,实力型人口是指要通过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保持适度规模和恰当比例的年轻人口,年轻人口是人口实力的主要象征。为此,需要两手抓的是:

首先,重视“青少年生育力”的保护,这是提高生育率的基础。整合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模式:第一种是操守教育,传播以敬畏、耻感、禁戒为主旨的青少年性文化,目的是让青少年在血气未定时尽量杜绝未婚性行为;第二种是安全教育,

目标是保证青少年性安全与生殖健康;第三种是成长教育,把两性教育纳入青少年生命成长、人格完善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提高生育率之根本在于重建中国人的婚姻观、家庭观和生育观。婚姻肩负着传宗接代的神圣使命,是两性的责任契约,这是应该传承的传统婚姻的核心价值。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家国天下。国之本在人,人之本在育;百年树人,人口优成。具体些说,在低生育负外部性呈现之时,政府须承担更多优生服务和福利保障的责任,要降低年轻家庭所负载的生命全程的二孩生养压力,以平均生养两个孩子为合适之家,激发年轻家庭的生育向往和热情。据全国妇联调查,超过一半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这就不是单纯的生育政策调整可以胜任的,而是需要生育、家庭、老年“三友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体系的及时构建。人口问题的形成有一个潜伏期,而其一旦爆发,则很难治理,只能承受苦果。

其二,创新型人口则是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打造最大规模的知识型人口、思想型人口和智慧型人才,最大程度收获人口的脑力红利、思想红利和创新红利。

其三,团结型人口是指老少男女人口关系团结、和谐共生,打造最大规模的爱心人口,一个以仁爱为信仰的人口一定是团结互助、坚不可摧的人口。如果说两性平衡、代际均衡就是优良的人口数量关系,那么人际和谐、代际互助是理想的人口社会关系。

其四,平衡型人口是说男女老幼比例恰当,人口生态优良,体现了人口的多样性、互补性和进化性,保持人口生态的动态平衡是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前提。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句话说得好:“让老年人拥有幸福的晚年,后来人就有可期的未来。”

其五,自强型人口奉行的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人口发展理念,不断优化人口的品质和力量,以人为本、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内圣外王。人口强则国强,人口优则国优,从而印证了 19 世纪法国思想家孔德的一句名言:人口就是国家的命运。

综上,中国不仅要保持“人口大国”的人口规模优势,而且要打造“人口强国”的人口结构优势和人口品质优势,向先进国家学习,借鉴全球经验治理好新时期的中国人口问题。

China's Population Crisis and its Response

Mu Guangzong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formed three basic judgments about our country's structural population crisis: namely, the overall situation has been settled, 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have no longer existed, and a disaster is imminent. Based on the above three judgm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construction and way out of China's population, pays attention to the connotativ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our population, and creates and builds the “five-type Chinese population”, a development goal for population optimization which is worthy of striving for by all the people. China should not only maintain its advantages as a “big country with large population”, but also cultivate its advantages as a “strong country with large population”.

Key words: low fertility, sub-replacement fertility, population ageing, ecological imbalance of population, population optimization,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管 琴)